

汗之意”，表达与突厥“共敦邻好”^①的诚意。二是与突厥和亲，以结成并巩固与突厥的同盟关系。三是经济援助和高规格招待。为了紧紧拉住突厥，北周每年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常以千数”。^②西魏、北周不断调适与突厥的关系，收到了显著效果。一方面，西魏、北周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了突厥侵扰之忧，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内部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西魏、北周与突厥结成了军事联盟，共同对付东魏、北齐。

综上所述，西魏、北周虽有胡风、胡俗回潮或对汉化政策反扑现象，但与东魏、北齐相比，回潮的幅度较低，范围较窄。从总体来看，西魏、北周主要是对孝文帝汉化之路的逐步回归和对民族关系的不断调适，使其民族矛盾比较缓和，政权比较稳固，势力不断壮大，国力日渐增强，为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魏、北周新的汉化，掀开了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新篇章，为后来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反观“地半天下，国富兵强”^③的北齐，因胡化越来越重，矛盾突出，最终走向了灭亡之路。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 书 讯 ·

吉林大学程妮娜教授著《古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已由中华书局于2011年7月出版。

《古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增补而成的，全书40万字，由绪论、汉至北朝时期东北民族地区建置、隋唐王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辽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金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元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明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清朝东北民族地区建置、余论等九章构成。《古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试图从国家结构的角度对东北民族地区建置的起源、转型与发展进行梳理，以探讨古代中国不同时期东北民族地区建置的形式、特点与政治功能，进而阐述其对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与巩固的关系。该书对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的梳理为我们了解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发展历程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作者从东北地区局部入手以阐明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建置进行管理是一种历史传统，也给我国的边疆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

① 《资治通鉴》卷169，文帝天嘉四年。

② 《北史》卷99《突厥传》。

③ 《周书》卷19《杨忠传》。

可见，抗战时期云南所产粗铜通过云南炼铜厂、云南电气制铜厂以及重庆精炼厂电解或精炼成精铜，这些精铜悉数运往中央兵工署下属各兵工厂及电气厂，用于制造抗战急需的武器弹药和电工器材，满足了抗战对特殊军事战略物资的迫切需求。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随着大部分国土沦陷，西南成为战略大后方，军工国防用铜量急剧增加，而原有国内主要铜产区相继沦陷，外铜进口受阻，云南成为国民政府控制的唯一的大型铜矿产区。云南生产的铜材从原来主要供给生活用铜转向重点供给抗战军需用铜，云南铜业成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略产业。为了满足抗战对铜的迫切需要，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云南铜业进行“彻底管理”和整合，对云南铜矿的采冶、运输和精炼实行统制管理，把云南铜完全纳入国家军备资源的范畴。国民政府通过扩大资金投入，积极勘探，调整生产，改进铜矿采冶环境和技术，创办精铜电解冶炼厂等措施，使云南军需用铜产量大幅提升，精铜生产逐渐形成规模，保证了抗战的军需铜材需求。云南铜成为国家军事战略资源，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时，云南铜矿的采冶、精炼技术有了极大的提升，云南铜业的生产规模和铜产量有了急速的提高，在满足抗战对特殊军事战略物资的迫切需求的同时，加快了云南铜业的现代化发展步伐。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 书 讯 ·

李鸿宾教授著《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 2011 年 1 月出版发行。该书全文 30 万字，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 23 篇论文，包括 18 篇史学专论，内容涵盖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隋朝的北部防务、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唐朝的华夷观及其变化、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朔方军、东突厥及唐朝后期北部地区的民族等；墓志铭考释 3 篇，主要是对安菩、穆泰、何文哲等三个墓志铭及其相关问题的考释；史学评论 2 篇，主要是作者对近年出版的李大龙著《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和王明珂著《游牧者的抉择》的评述。《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虽然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现，但是作者近年来对隋唐主要是唐朝北部边疆防务和民族问题的新认识，对于隋唐边疆史尤其是北部边疆史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文化中各种与北方地区有关的文化因素的发展脉络，只能知其大概。北方地区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是通过连接西北与西南的藏彝走廊实现的，大部分是通过文化的间接传播，也有伴随人群迁徙的直接输入。滇文化主要与西北地区的氏羌族群关系密切，大量氏羌族群或与其相关的民族大规模南下，并在西南山地广泛分布，僰、昆明、叟等民族在滇文化分布区出现，其中的少量印欧人种可能与湟中月氏胡有关。

以上关于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及族群关系的研究仍只是一个初步结论，要廓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还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方法，如体质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加入会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金莲山墓地出土的大批人骨可能是一个契机，对其综合分析将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 书 讯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博士著《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一书，已于 2009 年 11 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 23 万字，共分六章，主要对清代著名的边疆史地学著作《皇朝藩部要略》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一章利用稀见史料，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祁韵士及张穆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二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成书背景以及版本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诸多史实进行了考证；第四章考证“藩部”概念的提出及其形成过程；第五章对清代的“藩部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第六章对《皇朝藩部要略》进行了全面评价。

综观全书，既有对《皇朝藩部要略》一书的文本研究，又有对清代“藩部”概念及体系的系统阐述，观点新颖，对清代边疆史尤其是藩部研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望奋斗成功的想法越来越普遍。塔金人中出现了一些实业家，他们在印设“上苏班西日县”县城达坡日久镇开有店面，与来自其他部落的商人竞争。来自印度的现代服饰也逐渐被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塔金年轻人认可和接受。外来的金属器皿、日用品和装饰品威胁着塔金部落传统手工业的生存。

尽管受到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剧烈冲击，祭司、民族手工艺、传统歌舞等并未在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的珞巴族塔金部落中消失。塔金人也意识到了保护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随着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珞巴族塔金人群意识和自治意识逐渐增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特色文化受到应有的重视。塔金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采取了继承和保护的态度，每年 1 月举办的“司一栋伊”节，便是塔金人身着民族盛装、增强族群认同的最大规模活动。正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之中，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的珞巴族塔金村落在发生着悄无声息、却可捕捉的变化。

〔本文责任编辑 张永攀〕

· 书 讯 ·

尚衍斌教授等《〈饮膳正要〉注释》已经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饮膳正要》是元朝饮膳太医忽思慧在 14 世纪 30 年代编撰的一部宫廷饮食专著。此书不仅集中反映了元代宫廷饮食结构的变迁，还涉及植物、动物、营养、食品加工等诸多学科门类，资料十分丰富，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注释，影响了学者对此书的使用，《〈饮膳正要〉注释》的出版弥补了这一不足。

《〈饮膳正要〉注释》全书 38 万余字，作者不仅对《饮膳正要》产生的过程、忽思慧的族属、《饮膳正要》所载内容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版本及研究状况等做了探讨，而且力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饮膳正要》书中具体内容的梳理与注释，全方位揭示元代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历史轨迹。

了伊斯兰化的过程。到清代时，以回鹘为主体融合同化了诸多其他部族逐步形成了维吾尔民族。如同许多其他民族一样，维吾尔族在形成和发展中不仅融合、同化了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的许多农耕土著居民，而且吸收了这些土著族群的文化，这里面当然包括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饮食文化。馕最早源自当地绿洲土著农耕民族，并不是维吾尔族创造的，但在维吾尔族的形成和演变中却吸收继承了这一食物并发扬光大，从馕逐步演变出众多由“馕坑”烤制的食物，包括馕坑肉、烤包子、烤全羊、烤全牛等美味食品，并在发展中赋予了“馕”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含义。

三

馕就是适应新疆南部干旱气候、遥远路途、绿洲沙漠自然环境条件下当地土著民族创造的产物，回鹘在西迁之后便很快吸收了这一食物，并赋予了其新的精神内涵。维吾尔族先民在很久以前就认为，是水、火、土赋予了自然界生命，馕作为水、火、土的混合物是一种物化的神灵。维吾尔族在生产生活中积淀的馕文化遗产是原生态的文化基因，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身份和发展方式。其打馕用的“馕坑”也是顺应自然，适应生存环境创造出来的生活工具。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 书 讯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厉声研究员、孙宏年研究员、张永攀副研究员合著《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已于2011年6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全文33.5万字，主要概述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和早年生活（1935—1949年），及1950年“亲政”到爱国与分裂的摇摆，再到1959年3月后在“冷战”阴影下的境外流亡，并重点介绍了1979年以来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政策、达赖的言行及国内外对其的反应。

该书资料翔实、叙述客观，有助于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达赖喇嘛，对西藏地方近现代史、当代西藏稳定与发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